



”滿洲國”的另類鄉土與性別流動：重讀王秋螢、梁山丁”鄉土文藝”書寫

劉，馨遙

(Citation)

海港都市研究, 19:15-24

(Issue Date)

2024-03

(Resource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Version)

Version of Record

(JaLCOI)

<https://doi.org/10.24546/0100488378>

(URL)

<https://hdl.handle.net/20.500.14094/0100488378>



“滿洲國”的另類鄉土與性別流動

—重讀王秋螢、梁山丁“鄉土文藝”書寫—

劉馨遙
(LIU, Xinyao)

“滿洲國”是流動的，在“五族協和”的表象下，立場各異、國族相殊的人群在跨域實踐中交匯，日本構建的帝國-殖民體系複雜化了民族、階級與性別間的運作。1937年，滿洲文壇發生“鄉土文藝”論爭，主張寫鄉土的梁山丁、王秋螢也筆耕不輟，持續地書寫底層農民、礦工、知識青年的悲慘運命，暴露殖民地經濟體制下鄉土凋敝的現實。這些小說情節較為簡單，敘事模式重複，以往研究大多致力於發掘作家們的抗日意識和文本的史料意義。還需注意的是，源於諸種文化背景之交雜與狹窄的思想言論空間，殖民地文學往往呈現出不甚分明的曖昧特質。近代制度對人與世界的重塑，伴生著殖民的慾望與行動，是故“鄉土”也絕非不言自明，其內涵被不同視線貫穿，經驗著增殖與改寫。重返“鄉土文學”議題，即便冠以“滿洲國”等地域限定詞，也會發現其無法表意某一穩定的、本質的存在空間。不同於傳統農村，“滿洲國”作家筆下浮現出另類的鄉土—礦區與森林，諸如王秋螢的中短篇小說《礦坑》(1940)《小工車》(1941)與梁山丁的長篇小說《綠色的谷》(1942)。礦區與森林之所以另類，一則與作為近代產物的區域“東北”的自然資源、獨特地貌有關，殖民入侵導致鄉土崩解進而重新界定了空間意涵；二則源於礦區介乎城鄉之間，森林溢出城鄉之外，構成了檢視殖民現代性衝擊之下“都市/鄉土”二元結構的契機；三則因為兩位作家所寫的礦山與森林幾近於男性世界，他們與外界的關係依靠以性維繫的家庭或者性的交易。那麼，王秋螢、梁山丁如何經由小說構建了另類的鄉土？鄉土與性別交疊的流動性怎樣推進對於殖民現代性的反思？

I. “鄉土文藝”何為？

如果要理解王秋螢、梁山丁的寫作，首先應回到“滿洲國”滿系作家內部發端於1937年“鄉土文藝”論爭。該論爭緣起於文藝雜誌《明明》在第1卷第3期刊載疑遲的短篇小說《山丁花》，這篇小說講述了兩個農村男性迫於貧困，只能在冬天入山為木材公司做伐木工，他們被剝奪了休息日，還需向公司租賃勞動工具，又要忍受酷寒與野獸的威脅，終於待到山丁花再開的春天，他們帶著僅夠回家路費的工資離開了山林，求生的夢在“公司”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破滅。梁山丁為這篇小說撰寫評論《鄉土文藝與〈山丁花〉》，主張“滿洲國需要的是鄉土文藝，鄉土文藝是現實的”²，引發滿系作家內部關於“鄉土文藝”的討論。與之持不同意見的文藝集團以古丁為核心，親近日本人作家並接受其經濟資助，注重對世界文學的翻譯，認為不應以“鄉土文藝”來規約文藝的方向。此論爭促進了滿系文壇的分化，有著明顯的同人性質，古丁等人先後創辦《明明》《藝文志》來踐行“寫印主義”，梁山丁則與《大同報·文藝專頁》吳郎、吳瑛等作者群關係密切，1939年創辦“文叢刊

² 梁山丁「鄉土文藝與山丁花」(『明明』第1卷第5期、1937年、27頁)。

行會”，但“《文叢》(季刊)出版未成，改出個人作品集，命名‘文藝叢刊’”³。王秋螢、陳因與《文叢》觀念接近，創辦“文選刊行會”出版《文選》等。王秋螢的短篇小說集《去故集》(1940)《小工車》(1941)先後由“文藝叢刊”“文選叢書”發行，也可見作家群之間的親疏關係。這些雖為同人雜誌，主張有別，但《文選》同樣刊有古丁的散文和爵青翻譯的紀德《官能之書》等⁴，意味著滿洲文壇的歷史現場也並非涇渭分明。

若論集團，疑遲與古丁交往頗多，寫作《山丁花》時沒有明確的理論訴求，毋寧說梁山丁借這篇小說提出了“鄉土文藝”。因此，論爭首先體現在對《山丁花》闡釋意義的爭奪。古丁認為“‘鄉土文藝’一說出自《百科大辭書》，一說無非當地的土產……這張漂亮的標就貼在《山丁花》上，於是，他們有了‘鄉土文藝’。”⁵古丁對“鄉土文藝”貼標籤式的做法頗為不滿，看似提倡不限制題材，“無非當地的土產”卻又隱含著貶抑的趨向。1940年《藝文志》發行“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特輯”，包含滿洲作家小傳，介紹疑遲時寫道：“《北荒》《山丁花》裏面的自然描寫，使他的小說富於大陸的氣息”⁶。當“藝文志”同人拋開“鄉土文藝”的標籤談論自然、大陸，難免與日本帝國主義向“滿洲國”投注的目光重疊。這也正是陳因等知識人所警惕的，陳因在評論梁山丁的短篇小說集《山風》時意識到廣泛的“鄉土文藝”包涵著法西斯愛鄉教育的層次，之所以仍堅持這一主張是為了避免小說被當作滿洲的“土產品”吸引日本的觀光客。他尖銳地指出，被大內隆雄翻譯的短篇小說集即使符合鄉土文藝，也不願與“鄉土文藝”同流，貶低後者為農村題材，“而認為是竊據世界文學的一角了”。他接下來辨析了“鄉土文藝”不局限於農村，而是關聯著大都市的問題，“資本獨佔的侵入，而影響到農村與手工業的破產與失業”。⁷換言之，鄉土/地方的再發現正源於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交疊的全球化流動，所謂傳統也是在與殖民現代性的關係中被重新發明。

這實質上還關係著風景、翻譯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糾纏，如果說語言之於世界“是在未能提供合格形式化模型的‘交界面’上”⁸，跨語際的翻譯則是以等值的幻象隱藏了權力秩序，也意味著不同慣習、傳統等“交界面”的遭逢、碰撞與錯開。那麼，翻譯為日語的滿洲文學成為了何種“世界文學”？“世界文學”與帝國主義全球擴散之間的隱秘關聯是否被多元主體的想像所掩蓋？“鄉土文藝”論爭看似在“地方/世界”之間徘徊，其實質仍然是無法被本質化的不同世界之間的衝突。滿洲國“五族協和”的虛像之下是難以逾越的語言隔閡，如果說被翻譯成日語意味著成為“世界文學”，此“世界”既包括以日語為觸媒與近代知識、世界想像的接軌，卻也隱含了日本構建的帝國體系。那麼，“鄉土文藝”正是在與“滿洲風景”的韻頡中生成。只有意識到風景絕非自然之物，而是歐洲風景傳統的全球殖民擴張的產物，才能重新發現看似本真的草原、森林等為帝國主義幻想提供了空白之地。並且，“諸帝國把空間上向外擴展作為時間上向前推進的一種方式”⁹，這種進化的、文明的現代史觀塑造了對於殖民地風景的感知和想像方式，又以純粹“自然”為名與鄉土自身的傳統、語言斷裂在此意義上，鄉土的風景化及其抵抗構成了跨國語境的詩學問題。

還需注意的是，吸引日本觀光客的“滿洲風景”經過了“東洋”對“西洋”的模擬與對峙，日本構建的帝國體系處於與歐洲、亞洲的雙重緊張關係之中，“滿洲國”這一畸形產物作為偽獨立國協助日本製造虛假的烏

³ 王秋螢「從〈飄零〉到〈文選〉—東北日偽統治時期文藝社團的發展」(『新文學史料』第4期、1985年、169頁)。

⁴ 參見古丁「消閑雜記」(『文選』第1輯、1939年)；紀德「官能之書」(爵青譯、『文選』第2輯、1940年)。

⁵ 古丁「偶感偶記並餘談」(『一知半解集』、月刊滿洲社、1938年、66頁)。

⁶ 「疑遲」，(『藝文誌』第3輯、1940年、127頁)。

⁷ 陳因「山風」(『文選』第2輯、1940年、210頁)。

⁸ 斯坦納『巴別塔之後—語言及翻譯面面觀』(孟醒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24頁)。

⁹ 米切爾編『風景與權力』(楊麗、萬信瓊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19頁)。

托邦。柳書琴在研究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會議時發現，大會籌備委員一戶務執筆在文章中仍將滿洲文學與台灣文學、朝鮮文學等“地方文學”並論，暴露出帝國投向殖民地的視線。¹⁰那麼，陳因、王秋螢、梁山丁等作家拒絕讓文藝成為浪漫的風景，他們所主張的“鄉土文藝”以描摹鄉土來接近現實，毋寧說風景作為媒介折射出帝國主義與反殖民的錯綜。大內隆雄的翻譯實踐構成了殖民權力運作的具體場域，在滿系文學日譯方面，他的譯作、評論文章的數量之多使其無法被忽視。大內隆雄在中國學習、工作多年，思想左傾，弔詭的是，卻也源於無產階級的國際性對民族國家疆界的超越，他頗為自然地接受了“滿洲國”的形態，將之視為實踐左翼理想的實驗場。

大內隆雄同樣關注書寫底層勞動者的作家王秋螢、梁山丁。王秋螢的《礦坑》發表於1940年《文選》第2輯，大內隆雄將其譯為日文，第一回發表於日文雜誌《滿蒙》1942年第8期，然而，“僅刊出一期，就遭到日本檢查機關的查禁”¹¹。譯者後續在《滿洲藝文年鑑》中介紹《礦坑》為“一部刻畫了煤礦工人一家的慘苦多難生活的力作中篇”¹²。梁山丁的《綠色的谷》連載於《大同報》1942年5月至年底，小說發表兩章後，大內隆雄翻譯並發表在《哈爾濱日日新聞》。小說連載結束後交付出版，遭審查後予以發行。梁山丁在1943年小說後記中稱“我還感謝那位介紹滿洲文學的功勞者，他每天伏在酷暑的案頭把它逐日譯成日文……這對於我的鼓勵和影響是不小的。”¹³然而，梁山丁也因日譯本等原因而數次被批判，直至文革結束後平反。在小說1987年重新出版時，梁山丁寫自己當時“對日譯者感到疑懼和不安”¹⁴。時代變遷作用於言論場的更迭，同時也顯露出“滿洲國”內部因民族立場差異導致的警戒與隔閡。

那麼，為何《礦坑》的日譯被迫中斷，《綠色的谷》在審查刪除後得以迂迴地翻譯和出版？儘管“撫順煤礦”是日本殖民開發的“明星項目”，吸引眾多遊客到“滿洲國”觀光，但現代化機械、礦務局建築、礦場中運行的火車等營造了先進的優越感，礦工較少成為觀光客照相機捕捉的對象。王秋螢筆下受到重重壓迫的礦山勞動者，難以被順暢翻譯為“風景”，相較而言，《綠色的谷》中彷彿在時間之外的異空間森林和如農家少女般淳美的滿洲農村則頗具詩意。“‘風景’必須將自己表現為‘土地’的對立面，表現為與‘實際地產’無關的‘理想地產’”¹⁵換言之，礦產、植被等作為土地資源指向殖民掠奪，與之相關聯的如俄蘇、日本自近代以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科學調查和侵略開採，而風景的自然、純粹之美卻彷彿能抵達“永恆”，即便悽苦的勞動者在被觀看之時成為一種同情的風景，但也威脅著風景畫的和諧。在此意義上，兩位作家筆下的“鄉土文藝”在殖民場域中的複雜遭際提示了作為帝國權力運作場域的“風景”，其中交織著諸種帝國殖民與逆視帝國的視線，並且，視線的交互並不僅以目光的起點而論，殖民地如同無數組形態各異的稜鏡，差異視線在彼此映照中折射出更豐富的光譜。“鄉土文藝”論爭發端於1937年，隨着1941年藝文指導要綱等官制文藝政策出台，明確要求移植日本藝文，言論空間再度萎縮。因此，在大內隆雄翻譯《礦坑》與《綠色的谷》的1942年，森林較之礦山的審美屬性與性別氣質的分配，使其能夠在嚴密審查之下被曲折地翻譯為含混的風景。

日本殖民經濟入侵伴生著鄉土的危機，殖民現代性塑造了摩登的、頹廢的都市景象，作為其陰暗面，鄉村

¹⁰ 柳書琴「“外地”的沒落——台灣代表們的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彭小妍編『跨文化情境：差異與動態融合——台灣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72頁）。

¹¹ 王秋螢「東北淪陷時期文學概況（2）」（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編『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6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所，1983年，131頁）。

¹² 滿洲藝文年鑑編纂委員會編『滿洲藝文年鑑 康德9年度版』（滿洲富山房，1943年，52頁）。

¹³ 梁山丁『綠色的谷』（新京文化社，1943年，366頁）。

¹⁴ 梁山丁『綠色的谷』（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227頁）。

¹⁵ 同注8，16頁。

漸次崩解，岡田英樹認為梁山丁等作家對“鄉土文藝”的提倡和書寫意味著“拒絕在日本開發建設的基礎上創造的都市文明，主張回歸於大自然之中的滿洲大地。”¹⁶還應繼續探究的是，失地農民如何向礦區、森林等另類鄉土流動？鄉土與殖民地風景在何處分野、接合乃至“同床異夢”？性別怎樣作為反/殖民策略運作其中？

II. 城鄉之間的礦山與“女人交易”

王秋螢出生於煤炭資源豐富的撫順，因此對礦區生活頗多注意，作品聚焦於底層農工的辛勞貧窮和知識青年的困窘迷茫，有著自覺的文學理論、編撰滿洲作家論集的意識。他的中篇小說《礦坑》發表於1940年《文選》第2輯，同年收入個人小說集《去故集》；短篇小說《小工車》發表於《新滿洲》1941年第5號¹⁷，同年收入小說集《小工車》。這兩部小說集收錄了他在五、六年間創作的作品，在《去故集》序言中，他寫道自己長年失業、生活困窘，“有時往往因為想多換到一點稿費，使我沒有功夫對於一件題材仔細地推敲”¹⁸。他在寫作鄉土題材小說時，筆法頗為直白，與現實結合緊密，小說之間往往有相似情節復現。

在《礦坑》中，王秋螢描繪了年過四十的老礦工張斌，因身體衰老、工作吃力，處處被工頭孫富刁難，他的工資難以養活妻子、女兒和幼子。女兒為補貼家用，明知危險還是去煤矸山上撿煤渣，不慎受傷。礦區只有一家外國人開設的療養院，醫生說著異國的話，堅持先交錢才能治病，張斌跪地乞求、繳費十元，得以讓女兒在醫院治療一週。在層累的負債下，張斌走投無路而去偷盜，卻被抓捕並判刑六個月，在監獄中病死。張斌年輕的妻子被一直覬覦她的工頭孫富強佔。隨著年齡增長，孫富也墮入貧窮，將繼子虐待致死。在小說結尾，女人決心帶女兒離家出走。《小工車》書寫了往返於礦山到新市街的小工車上的售票員“老麵包”，他誠實勤懇地工作卻日漸貧窮，妻子和女兒幫人洗衣縫補賺錢，兒子偷煤來幫扶家庭。年關將至，還債和過年加劇了“老麵包”的困窘，礦工朋友借他的十元錢也被賭輸。他第一次在售票時藏錢，卻聽聞兒子被礦山勞務係職員所養惡狗咬傷，急忙跳車而摔破頭，藏在身上的錢也掉落滿地。

兩篇小說之間存在人物與情節模式的相似性，毋寧說作者關注的焦點隱含著特定的社會結構問題。首先應考察礦山何以成為另類的鄉土？每日往返於市街與礦山之間的小工車已點明礦區介於城鄉之間，與其他線路不同，這條線路專為礦山工人上下班和礦區居民而設，電車也格外破陋骯髒。《礦坑》中還寫道：“這雖然是一帶工業發達的礦區，但是除了日用的吃食外，要買的東西是非到十里外的一座繁華的市街不可。”¹⁹因煤炭開採而發明的礦區，實為被掠奪的、畸形發展的“地方”，其中的工業場景極為晦暗、令人生怖，現代機器彷彿巨獸，礦工、婦女、兒童茫然地向礦山而行，構成俯視視角下的不對稱風景。小說中雖然提及礦上的子弟學校、診療所等，但礦工的薪水不足以分享此類公共設施。離開土地的礦工難以自給自足，也無法成為殖民都市的真正主體，他們在礦山勞作掙取微薄的工資，在市街的藥店、賭場、影院、娼寮等空間消費。物價與工資不同比上漲導致礦工深陷資本的怪圈，工資無法轉化為可積累的資本，更無力抵禦衰老與傷病。並且，殖民都市的繁華市街空間實質上是由個與群的社會關係構成的，空間邊界與群體身份相互作用，《礦坑》中的新市街只有火車站附近多是國人聚集，“在稍東邊一帶，則多半是帶著異國色調了，不論是商店或住民，完全是日本人的居留地。”

¹⁶ 岡田英樹《偽滿洲國文學》（靳叢林譯、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年、104頁）。

¹⁷ 同注11、52-53頁。

¹⁸ 王秋螢「序」（『去故集』、文叢刊行會、1940年、2頁）。

¹⁹ 王秋螢「礦坑」（『去故集』、文叢刊行會、1940年、169頁）。

²⁰可見殖民地空間內部的區隔，王秋螢沒有直接說明礦山的經濟權為日本人把控，而是藉由張斌女兒受傷去礦區外國人開設的診所來隱晦地表達。

小說還提示了底層礦工群體的前史，即因鄉土崩解而從村莊共同體等社會關係中解離的失地農民，他們作為原子化的個體流浪，成為殖民地工業系統的潛在勞動力。譬如《小工車》中，年輕工人们让老礦工姜景順“再讲讲孙把头跟你从山东家跑来时的那副穷像”²¹，意味著礦工多是離開原鄉原土，出賣勞力以求生存的流民。具體至“滿洲國”又涉及到日本開拓團對中國傳統鄉土的衝擊，王秋螢在《血債》中寫農民黃金生在為“新移到的住民”勞作時“乘機望一望離自己不太遠的那一塊會屬於自己的土地”，又寫鄉土被現代產業切割，如制油工場、制米工場、消費組合等。日本多以“分村分鄉”向“滿洲國”輸送移民，原有村落形態與人際關係得以保存，其內部成立各種農業組合，統購統銷，收入為日本村民謀福利，形成排他性的自足共同體。伴隨著產業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增大，中國的失地農民被雇用或強制服勞役，流入殖民資本主導的商品關係，王秋螢關於農村、礦區的小說中頻繁出現的“把頭”即為日本殖民權力的經紀人，“專憑著替這些新來的住民包工”，從不平等的僱傭關係獲利。

《血債》中提到“一些地主，已經完全變成佃農”²²，《礦坑》中出身書香之家的陳昇，他家的宅第與舊市街同命運，都因煤炭的過度採掘而塌陷，他也淪落至以搶劫偷盜為生。那麼，舊市街被新市街取代，也寓意著鄉土經紀人及其所屬權力的變遷。秦暉在論及宗法共同體時指出，“封建社會的人身依附實質上是宗法共同體對個人的束縛—‘保護’紐帶”²³，小農經濟的低生產力水平要求共同體成員之間緊密協作從而抵禦風險，地主作為鄉村菁英，承擔著溝通中央集權國家與分散小農的職能，除了用租賃土地、放高利貸等經濟手段控制農民外，地主還提供和管理教育、濟貧等福利性組織，承擔著調節生產、維繫倫理等社會文化功能。殖民勢力一方面與上層地主聯合以維繫鄉土秩序之穩定，卻也導致部分地主向底層階級的流動，地主的普遍缺位致使原鄉之於失地農民已失去保護性的可能。“把頭”作為殖民勢力尋找的經紀人，代行殖民之權來為己身牟利。在殖民語境中直接批判日本顯然是危險的，因此小說里的“把頭”成為“惡”的具象。然而，《礦坑》還寫了衰老的孫把頭也被礦山拋棄了，恰恰提示了礦工的悲劇並非僅僅由於個體作惡，而是因為殖民權力始終在尋覓更年輕、物化了的勞動工具。

當礦工呈現為被侮辱、損害的勞動者，與之相伴的是男性氣質遭遇威脅，尤其表現在年輕妻子被把頭覬覦乃至脅迫通姦。譬如《礦坑》中張斌為生病的妻子做飯而上工遲到，當孫把頭得知張斌的妻子才三十歲，開始在言語上諷刺張斌，處於低位階的張斌只能忍讓。在張斌病死在監獄後，女人無力養活自己和孩子，雖不願意卻只能委身於孫把頭。蓋爾·魯賓以“女人交易”洞察性的政治經濟學核心，即父權制將女性作為“禮品”/資本的象徵物，置於“送禮人”/男性權力秩序中流動。²⁴殖民語境將該問題複雜化，民族/階級的話語都借用了被掠奪/強暴的女性，女性作為關係的搭建物，以潛抑、無名的狀態維繫一整套權力秩序的運作。

這兩篇小說都設置了礦區/市街/家庭三個空間，採礦主要要求男性勞動力，礦山也近乎男性世界，婦女與孩子無法成為礦區的勞動力，只能在廢棄的煤矸石中找煤渣，或在廢墟般的家庭空間承擔病弱馴順/忙碌缺席的無聲角色，而老年男性礦工的勞動價值及男性氣質被逐漸耗竭，無力庇護妻兒。那麼，問題在於，底層男女如何

²⁰ 同注 18、170-171 頁。

²¹ 王秋螢「小工車」(『小工車』、益知書店、1941 年、81 頁)。

²² 王秋螢「血債」(『小工車』、益知書店、1941 年、110 頁)。

²³ 秦暉『田園詩與狂想曲』(語文出版社、2010 年、125 頁)。

²⁴ 參見蓋爾·魯賓「女人交易一性的“政治經濟學”初探」(佩爾·麥克拉肯編『女權主義理論讀本』、艾曉明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48 頁)。

被組織進入並維繫殖民工業體制？社會性別制度在礦區空間怎樣延續與變形？農民男性失地之後流向工業或變成盜匪，不會有土地經濟權的女性則面臨自身成為商品的危機，或者成為城市娼寮里的妓女，或者結婚進入家庭空間，在承擔生育及家務勞動的同時，還通過幫人洗衣、縫補等商品化的家務勞動來賺錢。比如，從《小工車》中“老麵包”女兒口中可以得知“媽媽去到老張家給人送做好的棉袍”²⁵，而她自己的孩子卻沒有錢買新的衣料。礦業生產需要穩定的男性工人，殖民體系將礦工的生活保障轉嫁給核心家庭中的女性，吊詭地同時出現了家務勞動隱形化和商品化，在母親出外勞動時，由女兒代行母職，並且，養老則有賴於女性生育下一代男性。《小工車》中“老麵包”的好友姜景順是單身漢，薪資幾乎都用於消費，在面臨衰老時只能寄希望於友人的家庭。由此，城鄉之間的礦山及其後的殖民權力藉由家庭內外的“女人交易”實現了生產與再生產的封閉循環，持續地向礦山輸送勞力。小說中底層男性在被殖民、被壓迫而“男性氣質”受損之時賭博、酗酒，乃至將礦區等公共空間遭遇的民族與階級不平等複製到家庭內部，走不出家庭或被性化的底層女性則經驗著更為隱蔽的、重層的痛苦。

在《礦坑》的結尾，王秋螢設計了女人帶著女兒離開孫富的情節，儘管未說明將去往何處，但都市空間為女性的流動提供了自由與被役使的雙重可能。這引發了批評，有評論者認為“滿洲下級婦女沒有這樣目的地出走的能力”，山丁也指出“為了完成一件藝術品，一件‘永遠的東西’”，不應有這樣的失敗。²⁶王秋螢在《去故集》的序言中寫道：“我往往不忍把每一個爽利的處死，而且使他們走上一條生路。其實我也知道生路即是死路，但我總不願再殘忍的明示出來。”²⁷他在《血債》中同樣刻畫了離家出走的男性農民黃金生，他在雪夜血刃誘使妻子通姦的李把頭，消失在茫茫山林中。然而，男性的離家頗有俠義小說之感，底層女性的出走被評價為不符合真實，不免顯露出男性作家的觀察視線，這本身也構成了由性別重返“真實”的契機。“滿洲國”語境下的“女人交易”疊合了殖民工業化的政治經濟結構，無力離開家庭空間的女性，抑或是向城市公共場域流動卻墮入深淵的女性，是既往性別秩序的延續，也是礦山這一另類鄉土空間的特殊變形。

III. 時間內外的森林與愛的“消隱”

梁山丁《綠色的谷》寫於1942年，在《大同報》連載至年底，1943年交付出版社印刷，1987年的再版經由日譯本補充和作者修訂，小說與原作面貌不一致，對關於日本人和小白龍的情節做了“自我美化”²⁸。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梁山丁在開原大獅子溝避難，1933年他的《山溝雜記》敘述鄉村風景之美並讚頌農民“工作的有忍力的沈著”²⁹。儘管農民之於他仍可能是抽象的，卻埋下持續思索的火種。他在1989年回憶小彪“是寫我的一個朋友，他是一個娶了日本老婆的留學生，他是靠了地主家庭才去日本留學的”³⁰。《綠色的谷》中掙扎於傳統鄉土與新興文化之間的林彪，未嘗不是梁山丁等知識青年的懂懂之影。並且，小說在結尾時提及“九一八”的砲聲，將時間向“滿洲國”成立前推移，有為規避政治風險的考量，但根據學者劉曉麗對小說內在

²⁵ 同注 20、85 頁。

²⁶ 山丁「《去故集》的作者」（『滿洲作家論集』、實業印書館、1943 年、278 頁）。

²⁷ 同注 17、5 頁。

²⁸ 參見牛耕耘「山丁研究—『滿洲國』を生きる作家の生涯と作品」（首都大学東京、博士（人文科學研究科）、2019 年）。

²⁹ 梁山丁「山溝雜記」（『大同報』1933 年 9 月 24 日）。

³⁰ 梁山丁「心有靈犀一點通」（『東北現代文學研究』第 1 期、1989 年、130 頁）。

邏輯的考察，主體故事的發生時間應該為1934年³¹，也即“滿洲國”成立之後。

《綠色的谷》開篇即是對狼溝風景與霍鳳強健體魄的讚美性描寫。杜贊奇指出綠林好漢作為森林的人類代表“生活在社會時間之外，但對於維護共同體的公平正義，和革新生活以抵抗腐蝕性、破壞性的力量來說，是不可或缺的。”³²他還認為梁山丁忽視了鄂倫春族等森林原住民，將森林視為空白之地，並把源自中心的傳統投射其中，而各種政治力量對“地方性”之爭奪，實質上是源於通過控制再現形式從而控制地方的邏輯。杜贊奇恢復了歷史的複數可能，卻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森林正處於真實的殖民社會歷史時空。日本開拓團往往佈局在軍事要塞，武裝鎮壓抗日，並將中國農民驅逐到“集團部落”實施軍事化管理從而切斷民眾與抗日力量的聯繫。正是殖民勢力對滿洲鄉土的顛覆促使失地農民或流入都市與礦區的底層，或流入山林潛伏於危險之中。在《綠色的谷》中，梁山丁隱去了大熊掌淪為胡匪的前史，而是以貧富懸殊的敘事將農民與胡匪聯結，指認出他們相互流動的現實。小白龍隊伍魚龍混雜，不僅派系內鬥、燒毀村莊，還綁架小彪索要贖金，如此描寫與往往作為正面力量出現的抗日武裝不同。對此，岡田英樹指出，梁山丁寫作時的“滿洲國”允許描寫危害農民的鬍子，但他著重書寫了土匪與地主之間的不共戴天，將鬍子襲擊村莊時農民老太婆的死處理為自殺，用這樣的插曲來做掩護。³³那麼，梁山丁的曲筆得以實現，正是藉由森林這一介於時間內外的曖昧風景，性別氣質的分配作為敘事策略，將“綠色的谷”呈現為不同視線糾纏的滿洲鄉土。

《綠色的谷》可讀為一部男性成長小說，憂鬱的中學畢業生小彪從南滿站回到狼溝有意想要“揚棄那些沈積在他血管里的羅曼氣質”³⁴，在是否去念大學一事上猶豫不決，對人生也持有“隨便玩玩”的虛無態度。他幾乎同時地被兩位性格活潑的少女吸引，即下坎少女小蓮和日本女學生美子。女學生與近代戀愛觀念對於小蓮而言陌生而危險。在被小彪讚美與表白時，她好奇地詢問小彪在南滿站與女學生戀愛是怎樣的情形。她因戀愛而分享了小彪的都市視線，從而對自小習慣的山野忽然感到“不可名狀的美麗，鮮豔，可愛”³⁵。小彪的母親與姑姑都極力阻止二人結婚，頗為悖謬的是她們都經驗著鄉土禮教“滯重”一面，小彪的姑姑與管家霍鳳未婚有孕，掙扎於愛情與維繫林家體面之間，小彪的母親出身下坎，喪夫後為幫扶弟弟而改嫁。她們為小彪選擇的良配是門當戶對的老馬堡地主佟老秀的女兒，一個在北京念書的“滿洲國”女學生，她的婚事完全被父親佟老秀決定，“我們秀英，諒他不敢反抗我，打封電報就可以叫回來”³⁶。雖然近代戀愛話語帶給小彪等學生以“知”的覺醒，在姑姑阻止小彪逾越身份與小蓮戀愛後，他只能求助於有島武郎來汲取關於愛之正當性及其衝決家庭制度的能量³⁷，卻無法以知識重塑鄉土。小彪用從書本上學來的“外來詞”向下坎農民們解釋自己的逃離，但他從農民們或質疑或麻木的反應已意識到話語的虛弱，之後與小蓮不告而別。

回到南滿站後，他陷入與美子的戀愛。然而，小彪與日本女學生美子之間有著微妙的不平衡，小說中的美子母寧說是空洞的，她活潑美麗、有知識，對小彪描述的滿洲豐饒鄉土懷有天真的嚮往。小彪強調其與哀傷的“滿洲國”女學生之間的差異，讚賞日本女學生理想高遠，而“滿洲國”女學生讀書只是為了嫁人。殖民秩序與性別秩序的支配/被支配關係錯綜，使得小彪對美子的態度頗為糾結，他訴說自己愛美子勝過愛小蓮，卻有著

³¹ 劉曉麗「自然寫作的詩學與政治：偽滿洲國殖民地的“風景”研究—以山丁《綠色的谷》為中心的考察」（《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18年、第46頁）。

³²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229.

³³ 同注15、104頁。

³⁴ 同注12、45頁。

³⁵ 同注12、70頁。

³⁶ 同注12、207頁。

³⁷ 參見劉立善「有島武郎與《綠色的谷》」（《東北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1995年、80頁）。

“過分的敵愾心”，沒有想與之結婚。需注意的是，在二人決定赴日留學一事上，1943年的版本中小彪在美子面前沒有勇氣說出自己的想法，他只有朦朧地要突破時代憂鬱的衝動，決定留學源於美子高遠理想的誘使。然而，1987年的版本修改為小彪先於美子想到仁人志士留學歸國，有意增強小彪的主體性。此外，另一處修改也值得注意，梁山丁將母親與小彪商議婚事時所說的“你這樣的歲數，說不定遇到什麼奇怪的女人”³⁸改為“有不少留學生和日本姑娘結婚，結果……錢太太很擔心地說”³⁹。前文中小彪追問霍鳳從狼溝帶來什麼別的消息，1943年版本中“奇怪的女人”所指是小蓮還是美子不甚明確，1987年版則將民族矛盾清晰地置於前景。兩處修改表達了作者去殖民的意圖，卻也改變了人物的性格。還有研究者指出大內隆雄將小說中日本女學生美子對滿洲鄉土的迷戀由原文“狂熱的情人”翻譯為日語“子供”，以避免令日本讀者感到不快。⁴⁰從翻譯策略中亦可見風景與性別之間權力秩序的糾葛。

小彪帶美子在留學前回到狼溝，不幸被綁架，美子裝啞巴被小白龍放走或許是回避民族衝突的有意設計，美子隨之消失在了敘事中。直至小彪從密林逃脫，他再次想到美子。只是在留學夢碎、森林歷練後，他潛在顛倒了二人之間的關係，希圖從高遠理想的聆聽者變為布道者。小蓮則被他遺忘，曾經潑辣的少女在被小彪拋棄後變得憂鬱，成為林家的幫工，被許配給下坎的崔福。相較於出身優渥的女學生們，小彪的離去將無法行動的鄉村少女小蓮置於名譽毀損的深淵。小彪劫後餘生回到林家時，小蓮向他哭訴被迫嫁人，而小彪眼里的小蓮變得豐腴、沮喪、蒼白，他實則早已忘記了小蓮，小說最終還安排了母親隨錢家逃離南滿站和姑姑林淑貞的死亡，小彪的戀愛及其阻礙全部消隱了，他也就不必做出抉擇。那麼，小彪在托爾斯泰和有島武郎的影響下放棄土地，最後擁抱著綠色的山谷，雖然潛藏著抵抗有產階級與殖民的可能性，但其隱暗面依然是左翼男性主體無力攻破的。

小說中小彪的成長並非源於戀愛，而是發生在另類的鄉土空間，即小白龍、大熊掌等“鬍子”的藏身之處——原始森林。書寫森林不是梁山丁的獨創，“滿洲國”通俗文學中的山林俗話、俄系作家拜闊夫等均有相關描寫。比如，拜闊夫的另一身份是動植物學家，曾從事對中國東北的自然調查工作，他生動地描摹了大自然與森林居民，頗受日本重視，曾作為“滿洲國”作家代表參加1942年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大內隆雄為拜闊夫小說中譯本作序時寫道：“可以發現滿洲文學的顯著的特色。那就是雄大性。是強悍的性格。”⁴¹另有《拜闊夫傳》談及日本作家菊池寬等重視拜闊夫的書寫在滿洲野獸生物學和人種學上的意義，並且，許多日本學生給拜闊夫寫信，“內容均稱狂喜他的書，因他很清楚的描寫出來滿洲的大自然，和人型，強健的身體和靈魂，因此才完成了捨身博愛的偉業。”⁴²可見，這其中包涵著科學調查與殖民史的糾纏，也有對森林原始強力、適者生存法則的崇拜，性別氣質諸如“雄大性”等被用於維繫整套機制的運轉。

在《綠色的谷》中，小彪回到狼溝時渴望“征服一隻鷹”，小蓮、霍鳳、大熊掌都會被他視為鵠鷹。但小蓮在戀愛的魅影中枯萎，霍鳳作為林家的管家、姑姑的情夫、大熊掌的好友，身份曖昧，有著痛苦的感傷情緒，乃至成為大熊掌口中與狼相對的“看家狗”。小彪被綁架後，大熊掌不惜與匪幫反目來協助小彪逃脫，小彪視線中的大熊掌“是從山谷、密林、大地之中鍛煉出來的虻牛”“彷彿是這山谷、這密林以及這大地的縮體”⁴³。

³⁸ 同注12，196頁。

³⁹ 同注13，122頁。

⁴⁰ 牛耕耘「山丁『綠色的谷』をめぐって—描かれた日本人女性の問題」（『知性と創造—日中學者の思考』第5期、2014年、100頁）。

⁴¹ 大內隆雄「『牝虎』序言」（拜闊夫『牝虎』、曲舒譯、新京書店、1943年、1頁）。

⁴² 北青譯「拜闊夫傳」（『青年文化』第1卷第3期、1943年、45頁）。

⁴³ 同注12，340頁。

梁山丁筆下的森林幾乎是男性的世界，大熊掌的老婆住在狼溝的下坎，幫大熊掌傳遞消息，居於森林之外。小蓮家中沒有青壯男性勞動力，她便跟隨婦女們采山來貼補家用，霍鳳在歌謠里調侃未出嫁的姑娘采山吃“大酸梨”，暗示未婚先孕的性醜聞。森林作為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間，以貞節來規約和排斥女性。然而，大膽闖入山林的小蓮吸引了小彪，她被近代戀愛觀念誘惑，又被拋擲在原地，當小孩們再唱起“大酸梨”的歌謠，小蓮已無力反駁。可見，鄉村底層女性難以在新舊文化衝突中安放自己，落入接連的陷阱。另一位闖入森林的女性則是日本女性美子，她被小白龍綁架後僥倖逃生，因為受到驚嚇而住進醫院療養。由此，森林空間的純粹與正義實質上建立於“厭女”的社會時間之上，又以其本真性的外表掩蓋了父權制的社會法則。小說結尾處，在與大熊掌這一森林/男性氣質化身的同伴關係中，小彪熟練地使用鬍子的行話，用受傷的雙腳走出了密林，終於擺脫了憂鬱，在“森林”被賦予的性別/社會象徵秩序中找到自我的身份認同。這亦可視作小彪在小蓮/美子象徵的鄉土/殖民都市之外重塑主體性的嘗試，並以森林這一另類空間來試圖尋找新的現代路徑，從而有別於留學日本或南滿站所交雜的殖民現代性。

蕭紅曾是在北京上學、有婚約的東北女學生。她在散文《无題》中寫南方朋友們到了北方被風沙所傷卻謳歌起來，她認為“我想這對於北方的謳歌就像對於原始的大獸的謳歌一樣”⁴⁴，並將之類比於日本帝國主義。從中可見她對於蠻力的警惕，與其作為女性的邊緣位置不無關聯。《綠色的谷》中森林被純粹化為男性世界，從殖民現代性塑造的城鄉二元結構外尋找更新、抵抗的另類動能，卻也以敘事中“愛的消隱”放逐了近代戀愛話語與鄉村女性的問題。那麼，性別氣質的規訓與森林被賦予“本真性”的曖昧風景疊合，使得梁山丁對自然、強力的讚頌，也可能悖論性地被轉化和縫合於殖民者的邏輯和對“滿洲國”的話語建構之中。由此，介於時間內外的森林交織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投射的差異想像，呈現出滿洲鄉土成為“風景”時的錯綜複雜。

IV. 結語

在“滿洲國”嚴密的文藝管控下，滿系作家內部在文藝理論建設方面相較而言不甚充分，發端於1937年的“鄉土文藝”論爭激活了文藝理論的探討和文學創作實踐。本文主要考察秉持“鄉土文藝”理念的作家王秋螢的《礦坑》《小工車》與梁山丁的《綠色的谷》，其中浮現的另類鄉土—礦區與森林，因其無法被輕易整合進殖民都市/鄉土的二元結構，並呈現為男性的世界，而對習以為常的“鄉土”及性別秩序帶來衝擊，構成重新檢視殖民歷史的視角。1942年大內隆雄翻譯《礦坑》被迫中斷，《綠色的谷》得以翻譯出版，提示了將“鄉土文藝”翻譯為“滿洲風景”的隱蔽條件與策略，以及殖民場域內風景、翻譯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韻頌。

前人研究多聚焦於論述兩位作家筆下鄉土空間對日本殖民現代性的反抗，較少關注性別如何作為反殖民策略作用於權力秩序的運作。正是源於殖民勢力對原鄉的顛覆，地主與農民之間的束縛、“保護”紐帶失效，鄉土“經紀人”轉變為代行殖民權力的“把頭”；失地農民流入礦工業底層或山林之中。王秋螢書寫了介於城鄉之間的礦山，揭示了殖民工業體系利用“女人交易”轉嫁勞工的生活保障及養老需求。被殖民的痛感體驗表現為男性氣質受到威脅，梁山丁《綠色的谷》則試圖在殖民語境中重構男性氣質。小說中，近代戀愛話語吸引著迷惘的男學生小彪，但他與鄉村少女、日本女學生的戀愛不能消除其憂鬱。小說書寫了“鬍子”聚居的森林，通過性別氣質的分配，將森林構建為排斥女性的男性成長空間，賦予其以破壞性、更新性力量的魅影。梁山丁試圖以此作為反殖民策略，構想了留學日本所象徵的殖民現代性之外的路徑，卻也因對性別二元秩序及森林法則的強化，其筆下

⁴⁴ 蕭紅「无題」（『七月』第3集第2期，1938年，55頁）。

生機勃勃、強韌雄渾的森林也與日本投射的“滿洲風景”想像有接合之處。

由此，兩位“滿系”作家的“鄉土文藝”書寫呈現出了殖民地語境中社會性別政治的複雜運作。那麼，在重新凝視“滿洲國”的鄉土風景之時，性別在城鄉之間、之外的流動，表現為民族與階級、殖民與抵抗等諸種話語的雜糅。值得考察的不僅是構成風景的現代性條件及帝國殖民制度，被爭奪、建構的性別風景也應進入視野，從而恢復殖民歷史的複數面貌。

參考文獻

中國語（拼音順）

岡田英樹 2001『偽滿洲國文學』靳叢林譯,吉林大學出版社。

劉立善 1995「有島武郎與《綠色的谷》」『東北師範大學學報』1,77-81。

劉曉麗 2018「自然寫作的詩學與政治：偽滿洲國殖民地的“風景”研究—以山丁《綠色的谷》為中心的考察」『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45-51。

米切爾編 2014『風景與權力』楊麗、萬信瓊譯,譯林出版社。

蓋爾·盧賓 2007「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經濟學”初探」佩爾·麥克拉肯編『女權主義理論讀本』艾曉明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柳書琴 2013「“外地”的沒落—台灣代表們的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彭小妍編『跨文化情境：差異與動態融合—台灣現當代文學文化研究』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秦暉 2010『田園詩與狂想曲』語文出版社。

斯坦納 2020『巴別塔之後—語言及翻譯面面觀』孟醒譯,浙江大學出版社。

王秋螢 1985「從〈飄零〉到〈文選〉—東北日偽統治時期文藝社團的發展」『新文學史料』4,166-172。

王秋螢 1983「東北淪陷時期文學概況（2）」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編『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6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所。

日本語（五十音順）

牛耕耘 2019「山丁研究—『滿洲国』を生きる作家の生涯と作品」首都大学東京,博士論文（人文科學研究科）。

牛耕耘 2014「山丁『綠色的谷』をめぐる—描かれた日本人女性の問題」『知性と創造—日中学者の思考』5,88-104。

滿洲藝年鑑編纂委員會編 1943『滿洲藝年鑑 康德9年度版』滿洲富山房。

英語（字母順）

Prasenjit Duara. 2004,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